



史记艺术美 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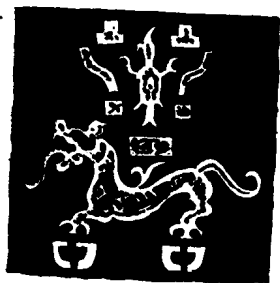
宋 嗣 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宋嗣廉

Shiji Yishumei Yanjiu

《史记》艺术美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史记》艺术美研究

Shiji Yishumei Yanjiu

宋 嗣 廉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20,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统一书号 10334·2 定价 1.25元

读《史记艺术美研究》（代序）

南京大学 郭维森

历代学者从史学角度对《史记》所作的研究，远过于从文学角度所作的研究。将司马迁看作伟大的文学家，将《史记》看作不朽的传记文学作品，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文学史论著逐渐将司马迁列为专章叙述，也有不少著作、论文对《史记》的文学特点进行了论述。但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对《史记》文学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其思想内容，而对其优美的艺术表现的研究则终嫌不够。如今，随着我国文艺研究的新的进展，新的开拓，《史记》文学的研究也必将呈现新的面貌。提到日程上来的是综合性的研究，包括：多种学科的交叉，纵贯与横通的考察，深层的思考、探索。《史记艺术美研究》便是努力向这个方向迈进的一部新作，它从几个侧面去论证《史记》的艺术美，发现《史记》的审美价值。在从美学角度去研究《史记》还不多见的今天，可以说这部著作开阔了一片新的园地。

在古人论述《史记》的片断言论中，对于我们认识《史记》美学特点最有启发的，我以为是“奇”、“神”二说。扬雄称司马迁“爱奇”，苏辙则称其“疏荡有奇气”，所谓“奇”意味着对现存法则的突破，亦即超常的表现。《史记》中那一些英雄的颂歌，那一些历史舞台上充满传奇

色彩的活剧，确实不同凡响。《史记》笔法也往往摆落常套，云龙雾豹，出奇制胜。至于章学诚，则用“体圆用神”四个字来概括《史记》的艺术特点，那就是说《史记》一书多变化、无定法，因事命篇，往往不拘义例。“用神”的“神”，并有“神以知来”的含义，也就是指对未来的预见性。司马迁自称写作《史记》要“述往事思来者”，即是力求在对历史的考察中把握未来的动向。因此他的写作是“微显阐幽”“旨远辞文”，表现含蓄而寓意深远，正如刘熙载所说：“《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史记》艺术的“奇”与“神”，说明它具有创造的美，变化的美，睿智的美。《史记》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曾有机会与嗣廉同志共同研读《史记》，颇得相互切磋之乐。如今分处两地，虽时有书信往还，终不得“相与细论文”式的畅谈。现在读了他所著的书，既受鼓舞，又得启发，写了上面的话，权且为序。

一九八六年一月

付梓小记

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风起云涌。据一九五七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一书提供的目录统计，《史记》一书的各种版本有一百多种，目录十几种，研究《史记》的著述和文章近七百部（篇），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著述和文章一百二十几部（篇），散见于非专门著述中有关《史记》的条目也有四百多。解放前部分的研究文献中，校勘、考证、读法、评注之类居多。建国三十年来虽也有些专著，但更多的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一年，国内近九十种报刊杂志及大学学报发表的研究《史记》的论文，有二百一十篇，约一百四、五十万字。这些研究成果无论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还是从内容和水平上看，都有新的突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史记》研究的内容更加广泛，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文化，从史学到文学，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并出现了向综合研究发展的趋势。可以预料，一个完整的专门学科——史记学将会应运而生。

笔者拟从美学角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为指导，对《史记》一书的写作艺术做初步探讨，以求为史记学这个伟大工程添砖加瓦。

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历代对《史记》的审美评价。《史记》作为史学对象、文学对象，历代多有评论。一些著名学者还把《史记》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进行了研究，作出了某些审美评价。重温这些历史评价，无疑会启发和促进我们对《史记》艺术美的再认识。本书第二部分主要是评述《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审美观，及《史记》的艺术美，其中包括评述艺术风格和艺术方法等等。《史记》的艺术风格是雄浑的，具体表现在所传写的人物多雄奇而悲壮；所叙述的事件往往具有某种气势和速度；其结构既庞大而又匀称。从艺术方法的运用上看，《史记》在处理“实录”与想象、褒美与贬恶、人物性格的多样与统一、共性与个性等方面都较好地体现了艺术辩证法，对后代文人的审美趣味及其写作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笔者深知，这个探讨是初步的，肤浅的，偏颇之处在所难免。愿就教于同行学者专家。

目 录

第一章 历代对《史记》的审美评价·····	1
第一节 “后人持重其书”·····	1
第一节 历代的审美评价·····	3
第二章 司马迁的美学思想及《史记》的艺术美·····	14
第一节 司马迁的非“中和”美思想·····	14
第二节 《史记》的艺术美·····	17
第三章 《史记》讽刺艺术美·····	44
第一节 褒美与贬恶·····	45
第二节 《史记》讽刺艺术遵循的原则·····	56
第三节 《史记》讽刺艺术的形式·····	60
第四节 《史记》讽刺的艺术手法·····	64
第四章 《史记》的艺术辩证法·····	72
第一节 实录与想象·····	72
第二节 多样与统一·····	89
第三节 共性与个性·····	97
第五章 《史记》《汉书》艺术风格之异同·····	104
第一节 西汉——东汉文学艺术风格的变化·····	105
第二节 《史记》、《汉书》艺术风格之异·····	108
第三节 《史记》、《汉书》艺术风格之同·····	128
〔附一〕非“中和”美的宣言书	
——读司马氏的《论六家要指》·····	133
〔附二〕平行交错 珠联璧合	
——试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结构艺术·····	142

〔附三〕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

——《万石张叔列传》的讽刺艺术…… 148

〔附四〕性格逐步深化 万变未离其宗

——评《李斯列传》人物性格的描写…… 153

〔附五〕“奸雄”，还是“贤豪”？

——兼议《史记》《汉书》两篇游侠传的异同…… 159

第一章 历代对《史记》的 审美评价

第一节 “后人持重其书”

当一个美好的事物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多愿意把一个最美好的称呼献给它；当人们在欣赏中发现它还有疵瑕的时候，叹息之余，又想尽快把它修补一下，使之更臻完美。对古代希腊雕像维纳斯是这样，对《史记》也是如此。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迁在《自序》中就自称其书为“太史公书”。两汉诸儒沿用这个名称，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称之为“太史公百三十篇”。直到东汉和帝永元以前仍普遍称为“太史公书”。那么，到什么时候才称做《史记》的呢？有人根据《史记》中九次出现“史记”这个词，认为《史记》一名即始于此。其实司马迁这里所说的“史记”，是指古史而言。梁玉绳说：“史记之名，当起叔皮父子”（《史记志疑》）。梁启超则认为“史记之名盖起于魏晋间”（《要籍题解及其读法》）。据高步瀛考证，“以史记称太史公书，殆起于后汉末年，魏以后因之。”陈直先生赞同之，并经具体考证指出《史记》这个名称始于东汉桓帝之时。由《太史公书》到《史记》，虽只是名称的改变，却反

映了人们对《史记》审美评价的变化。正象梁玉绳所说：

“盖取古《史记》之名以名迁之书，尊之也。”

（《史记志疑》）

朱筠也说：

“然迁书自名《太史公书》，不名《史记》。而后人持重其书，以为自黄帝以来，迄今楚汉古史之书皆赖以存，遂以《史记》之名当之，相传于世。”（《笥河文集》）

“后人持重其书”，不仅表现在“以《史记》之名当之”，也表现在《史记》问世以后学者的争相续补上。司马迁《自序》中说他的这部通史，上限是“陶唐”，下限是“获麟”，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由此可知，书中所记载的“获麟”以后的事为后人所窜补，皆非原文。据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时魏人张晏认为这十篇是：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唐代刘知几认为现在《史记》中的这十篇是元、成之间“褚先生更补。”褚少孙是一位十分崇拜司马迁、珍爱《史记》的学者。他曾经说过：

“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窃好《太史公传》。”（《史记·龟策列传》）

三家注本《史记》中标有“褚先生曰”以及低两格的文字，都是褚少孙所补。他所补的《外戚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都保存了第一手材料，为我们更多地认识汉代社会提供了便利。如《滑稽列传》中西门豹治邺一段文字即褚所补。清郭嵩焘指出：“西门豹有功于邺，史公传循吏不列西门豹，而褚先生以附之滑稽，斯盖两失之”（《史记札记》）。梁玉绳虽然也认为褚少孙这样做有些不伦不类，然而肯定褚“叙次特妙”。由此言之，褚少孙不失为后续《史记》的一大功臣。

第二节 历代的审美评价

两汉时期

司马迁宣布百三十篇的“太史公书”写完之后，正本“藏之名山”，副本存于京师的年代，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已经确立，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对立越来越突出的时期。儒道两家审美标准不同，对《史记》作出的审美评价也必然截然不同。西汉统治者，以“中和”美思想为正统，视《史记》若水火，隐恨而切齿。据说“汉武帝闻其（司马迁）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两纪有录无书”（《三国志·魏志·王肃传》）。那个存于京师的副本，由于藏之密而守之慎，能读到它的也只有少数官吏，如桑弘羊、王凤，校书的杨雄、刘向父子，博士褚少孙、桓宽、冯商等人，就连一般的王孙贵戚也难以见到。据《汉书·东平思王传》记载：宣帝的儿子刘宇屡屡

被贬、郁郁不得志，成帝初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结果是“天子如凤言，遂不与。”说《太史公书》中包括有纵横家的权谋，有汉初谋臣奇策，不过是掩饰之词，实际是担心《太史公书》中对现实强烈的批判精神，会助长这个受贬削地的王子更不满朝廷，危害汉家天下。西汉后期的思想家扬雄敏锐地认识到并第一个指出司马迁的《史记》中充满了与儒家思想对立的非“中和”思想，即“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并且具体指出司马迁和孔夫子思想的不同点就在于：“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重黎篇》）。这里的“奇”是作为“义”的对立面出现的。所谓“义”，无非是维持封建秩序的儒家道义；而“奇”则是指“微文讽刺，损贬当世”（班固《典引·叙》）而言吧。班氏父子则把《史记》的不合乎“义”概括为三个方面：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

这种观点随着儒道神化的发展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到了东汉后期，《史记》竟被斥为“谤书”。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王允因为蔡邕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叹了一口气，便定蔡邕为逆党，要杀头。有人请王允宽赦，让蔡邕续

成汉史，王允却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看来王允不但指《史记》为“谤书”，而且认为汉武帝没杀司马迁是个失误。正因为汉家王朝这样仇视《史记》，因之一直到东汉时期传习《史记》的人仍寥寥，远比不上较《史记》问世晚了一百几十年的《汉书》那样注家蜂起，流行于世。当时人们即或把《史记》与《汉书》连提的时候，也是采取“抑马扬班”的态度，称之为“班马”。人们可以给《汉书》加上一顶桂冠，而不敢直估《史记》的价值。

但这并非说汉代的正统儒家学者们对《史记》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是以是否符合本阶级利益这一标准来判定事物“善”、“恶”的。汉代正统儒家学者从本阶级功利主义出发，认为《史记》的“是非”观“谬于圣人”，因之，是不善的；然而对《史记》内容之“真”、形式之“美”，却给予了客观的评价。扬雄如此，班固亦如此。他们都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其标志有二，一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二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前者肯定了《史记》在语言表达上是“美”的，后者肯定了《史记》述事达到了“真”的地步。

魏晋六朝时期

汉末黄巾起义，严重冲击了汉家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随着儒教神学的破产，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形成，迎来了文学自觉的时代。反映在对《史记》的审美评价上，表现为正统儒家的传统认识开始被打破。当时，虽然仍有人把《史

记》说成是泄私愤的作品，如魏明帝曹睿就说过：“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三国志·魏志·王肃传》）等等，但当时更多的人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如王肃回答魏明帝时就针锋相对地说：“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注释《三国志》的裴松之，则批评了王允的“谤书”之说，他写道：

“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斯世，……但迁不为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人们不仅为司马迁辩诬，而且具体比较了《史记》与《汉书》的优劣，变“抑马扬班”为“抑班扬马”。晋人张辅认为：

“迁之著述，简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晋书·张辅传》）

傅玄也替司马迁打抱不平，活剥班固的话回敬说：

“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又见晋杨泉《物理论》）。

言下之意，极赞司马迁不掩饰君主之过失，敢于批评现实，

反对苟合取容，表扬正直气节。司马迁着重叙述的是人物的行为事实，而不在词章上面刻意追求，所以才被称为良史之才。

晋人葛洪具体驳斥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他说：

“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抱朴子·明本篇》）

南北朝时期，宋·范曄对班氏父子的讥评，也进一步地予以了驳斥，他说：

“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后汉书·班固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魏晋六朝时期，学者们更多是从《史记》如何冲破儒教的藩篱及《史记》的史学意义方面加以评价的，即充分肯定《史记》是善的，而不是恶的。当然也有人从《史记》感染性和愉悦性方面来评价，陶渊明就是一个。作为审美对象，如果不感人，就不能引起鉴赏者的愉悦和快感，就不能使人获得美的享受，受到美的陶冶。陶渊明认为，《史记》是“有所感而述之”（《读史述九章序》）的，即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心雕龙》）。当他“读其文”

时，被司马迁的感情所感染，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慨然惆怅久之”（《陶集六卷》）。

随着对《史记》估价的提高，研习《史记》的人也越来越多。《晋书·孝友传》记载：“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可见魏晋时期，《史记》已与五经并列，位置提到了《汉书》之前。《梁书·曹景宗传》记载：“曹景宗字子震……颇爱史书（指《史记》），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可见当时《史记》影响所及。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三家注之一裴驷的《史记集解》。张守节评价该书是“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及众书之目而解《史记》。”

唐宋时期

南朝时骈丽文学昌盛，当时许多作品辞藻华丽，但内容空虚，形成轻艳萎靡的文风和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唐初，不少历史学家在探讨前代的兴亡治乱时，看到了南朝文风之弊，于是或推论文学之源，或追求文学之本，以期纠正南朝文学的偏向。穷文之源则以古为式，究文之本则以情为主。在散文方面，他们大力提倡先秦两汉古文，反对和抵制东汉以后日趋发展的骈文。并且提出一个评价历史散文的审美标准。比如刘知几就说：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为主。”

“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缚说，理尽